

# 近代人物研究

## 论李文炳

——会党人物论之一

魏建猷

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中国近代史上风雷激荡、英雄辈出的时代。探索救民真理、为农民革命事业奋斗终生如洪秀全，忠贞不二、大节凛然如陈玉成等就是它的杰出代表。然而，和中外历史上任何其它类似的时代一样，在大革命的洪流中，总不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各种类型的人物都会乘机出来表演一番，出现了如郜永宽、汪安钧、伍贵文等献城投敌，断送革命，不齿于人类的叛徒国贼；还出现了反复无常，朝秦暮楚，如李昭寿、苗沛霖、李文炳等无耻之徒。

李文炳在当时算不上什么举足轻重的人物，但他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却未可忽视。他先参加小刀会起义，中途变节投降，效忠反动统治阶级，破坏小刀会起义。后来在镇江一带参加镇压太平军，因反革命有功，一路飞黄腾达。1860年春，太平军直压苏州城下，李文炳这时正防守苏州，看到大势已去，又投机革命，打开城门迎接太平军入城，而暗中仍与敌人勾结，准备背叛，并阴谋发动反革命叛乱。及至1862年5月（同治元年四月）曾国藩围攻天京时，他的投降活动幸被发觉，处以极刑。

李文炳的阶级属性是什么？如何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其一生行事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还其本来面目？解剖李文炳这样一个具体人物，我们怎样通过他加深对会党的认识，并从中获得有益的经验教训？这就是本文准备讨论的问题。

### （一）

李文炳原名绍熙，字少卿，投降太平天国后始改名文炳，广东嘉应州（今梅县）人<sup>①</sup>。据王韬《瓮牖余谈》说：

“初李以行贾至江南，丧其资，落魄海上，日从博徒游，每日与贷数十钱糊口。时海上有妓尤绿芸，貌美而多资，久厌风尘，思择而事。一日肩舆出门，李方蹲桥下乞博徒钱，舆来以其碍道，呵之，李起而反置焉，挥以拳，三舆夫皆辟易。绿芸即褰帘谓之曰：‘客何为者？请至我家以杯酒释忿。’李竟慨然诣其室，坐既定，索酒引满，罄无算爵。绿芸曰：‘观子貌非居人下者，何乃嵬嵬与匪类伍，此间苟足以屈子，请供饮食。’李许诺，遂居其家，颇勤谨。久之绿芸委身于李，出其资令作小运贩，获利颇饶，乃设茶栈，援例捐纳候补县丞。时闽粤之党颇横，当路方思各以其类羁縻之，故地方有事，居然

附缙绅后参末议”。<sup>②</sup>

王韬又说，李文炳早就是小刀会员，当上海小刀会酝酿起义时，上海道吴建彰打算给费遣散，破坏小刀会组织，就是由于李和闽人李仙云的活动，使吴建彰迟迟没有实行<sup>③</sup>，

《上海小刀会起事始末》也有关于李文炳的如下记载：

“嘉应公所董李绍熙，咸丰三年七月秋，小刀会将起义，他和李仙云等各会馆董事六人联名上海道吴建彰请以小刀会人作团练。”<sup>④</sup>

了解他的出身和他早期这段历史，对于认识李文炳之为人是十分重要的。第一，他到上海经商失败后，便混入赌徒堆里，每日靠乞“贷数十钱糊口”，由破产商人一变而为游民，可见他本来大约不过是一个小投机商，所以破产后自然成了流氓无产者。第二，他既曾混入流氓堆里，很可能那时已经加入小刀会组织，企图利用这个组织来满足自己营私谋利的欲望。至于向赌徒们胥索几文糊口，那绝不是他的真正目的。后来他借妓女的财力又发了财，其中未必没有利用小刀会之处。第三，他与妓女尤绿芸结合后，先作小运贩，后设茶栈。如何小运贩，虽史无明文，但开茶栈当时即是做鸦片买卖。由此不难推知，他贩运的无非是烟土，到了获得财富后，便开设茶栈，大做鸦片生意了。第四，他参加小刀会未必是真心革命，多半出于投机。这一点可从他经商致富后立即“援例捐纳候补县丞”一事得到证明。他是要升官发财，并不要革命。第五，他和李仙云等联名吴建彰“请以小刀会人作团练”，大概就是王韬所谓吴建彰迟迟未对小刀会“给费遣散”的具体原因。这就进一步证明，直到小刀会起义前夕，李文炳扮演的还是一个“附缙绅后参末议”的角色，是反动当局利用来对付小刀会的“羁縻”对象，他完全没有站在革命一边。如果说他确曾劝阻吴建彰解散小刀会的话，那也可能只是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未必一定是真心赞助小刀会起义。

1853年秋，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当时，太平军正以破竹之势，席卷长江中下游，奠都天京，先后占领镇江、扬州，江浙震动。作为大小官僚地主逃亡渊藪、财富集中地的上海，也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上海地区人民抗租抗粮斗争，此起彼伏，起义响应太平天国运动的要求已成不可遏止之势。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李文炳迫于形势，终于参加了起义，这一着算走对了。他以嘉应公所董事身份参与起义，客观上对粤帮起了较大的号召作用。王韬在讲到1853年9月刘丽川领导小刀会起义时，曾说“李亦预其列，而与李少轩皆用事，为刘‘贼’所信任，‘贼’中攻劫多出其谋”。<sup>⑤</sup>这些话虽或有些渲染，但亦可见其地位的重要。

可是，到了1854年10月前后，清江苏巡抚吉尔杭阿通过买办分子扬坊及其亲信吴煦等的奔走活动，取得法国侵略者的支持，在上海县城北门一带沿河筑墙，断绝起义军的军火及粮食供应，形势日渐恶化，斗争越发艰苦之际，李文炳这个投机分子变节了。他决定叛变，暗中“献内外夹攻之策于吉抚军（吉尔杭阿），”<sup>⑥</sup>准备内应。刘丽川发觉了他们一伙的阴谋，即将李的家属及其同谋三百余人一网打尽，却被李文炳逃掉了。<sup>⑦</sup>应该指出，在中外反动派的联合进攻下，小刀会起义军当时尽管困难重重，但只要内部精诚团结，一致对外，未尝不可以争取形势的好转。这时起义军还有较强的战斗力，可以与敌周旋。例如7月下旬清军在城南掘地道三次，埋藏火药，炸毁城垣，发动进攻，都被起义军英勇击退，迅速修复缺口，即其一例。而李文炳的投敌事件却造成了内部分裂，削弱了战斗力，从而加速了起义的失败。李文炳对人民犯了严重的罪行。李投降清军后，吉尔杭阿即赏给他六品衔，留军前差遣。<sup>⑧</sup>从此以后到小刀会起义失败为止的几个内，他干些什么反革命勾当，虽不能详细知道，但据吉尔杭阿《克复上海县城奏稿》说，他“曾被胁迫，旋即投诚立功”，<sup>⑨</sup>可见他一定是积极破

坏小刀会起义，为反革命立过功的。刘丽川战败牺牲后，上海反动官吏们认不清刘丽川的首级，就是这个叛徒李文炳出来具结证实之后，<sup>⑩</sup>才敢去报功的。

综上所述，由小投机商、流氓无产者发展为为剥削阶级效劳，由投机革命蜕变为反动统治阶级的得力鹰犬，这就是李文炳早期走过的生活道路。

## (二)

上海小刀会起义被镇压后，李文炳反革命活动仍然很积极。他自己出钱招募训练一支反动武装，跟随吉尔杭阿在镇江一带对抗太平军。王韬说他“冲锋陷锐，多积战功”，<sup>⑪</sup>1856年6月九华山战役中，吉尔杭阿兵败自杀，太平军“围李营三匝甚急，李堞垒坚守，经七昼夜，与士卒仅日一食，粮绝援穷，顾无变志。适张总统（国梁）大军驰至，围解得出，以是军营巨员大加奖信，前后捐擢，洊升道职”。<sup>⑫</sup>王步青也说他“降于前苏抚吉（言尔杭阿），后积军功，以道员用<sup>⑬</sup>”。九华山战役是一场很激烈的战斗，清军被打得落花流水，不久江南大营也被打垮，钦差大臣向荣因此急得一命呜呼。李文炳的顽抗，并未能挽救清军的大溃败，只达到他个人升官发财的目的，很快就升到候补道。在这以后，他的历史有一段不很清楚，只知道他曾隶属清提督张玉良部下。有人说他曾经驻守东坝，东坝被太平军克复后，他又投降太平天国。<sup>⑭</sup>东坝是个重要的军事据点，当时双方争夺很剧烈，如果李文炳确曾守过东坝，那就一定会增加无数反革命罪行。不过说他在东坝投降太平军，却不尽可信，很多记载都说他是在1860年太平军进军苏州时开城门投降的，<sup>⑮</sup>当较为正确。

1860年太平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席卷常州、无锡，直逼苏州城下，清朝文武大员自杀的自杀，逃亡的逃亡，下面多数混饭吃的喽罗们更不肯替清朝卖命，纷纷自找活路，准备投降。李文炳之流，也迫于形势，“知苏城难守”，<sup>⑯</sup>感到要保住自己性命，除投降之外，别无办法。因而他在部下两个勇目（一个姓黄，一个姓魏即魏芸青<sup>⑰</sup>）向太平军投诚之后，就与魏芸青二人私自出城见李秀成洽降，<sup>⑱</sup>接着便与另一清军头目候补知府何信义开城门投降了。李这样做，完全出于走投无路，迫不得已，并无丝毫赞助太平天国之意，是显而易见的。证诸九华山战役中他已陷于重重包围，粮尽援绝，七昼夜官兵仅日得一食，他还“顾无变志”，再证诸他后来阴谋叛变，可见我们说他这次投降只是为了伺机谋叛，绝非过甚其辞。

不过，由于李文炳的投降，苏州得以不战而下，也是事实（当然，苏州之易下，尚有其他原因，如1. 张玉良部投诚，2. 苏州未战先乱等等）。王步青《见闻录》云：

“守阊门候补道李绍熙，……徐抚授以标兵二百，使率常熟兵二百守门。李开门纳‘贼’。十三日昧爽，‘贼’大股入城，戒勿声，分股，一袭官署，一上城巡，环走六门，胁降官军。徐抚方与朱按察议事署厅，烛未火，闻变，朱曰：‘大人请自为计！’踉跄奔出，而‘贼’已开署，不得出，反奔，投井死。徐抚预衣朝服，自跃于池，奴仆拯之，及取短柄火枪反击胸膛，洞穿而死。蔡布政面不及盥，匹马短衣，出葑门遁。苏府吴（云）匿民舍，后逃至上海。长、元和、〔吴〕三邑皆潜身走。官军之守六门者，每夜赌博，欢呼畅饮，聚吸西洋鸦片烟，达旦始睡。‘贼’悄入其营，但闻鼾声如雷。‘贼’大呼曰：‘好妖！天大明身犹不起。’盖‘贼’称官为妖也。兵众有惊起者，有睡方浓而未觉者，‘贼’或揪发辫，或击以刀背，或从衾中拖出，而睡眼矍矍，尚言‘毋戏虐’！以为同人戏己也。间有奔逸者”。<sup>⑲</sup>

这就是说，太平军攻克苏州并未经过战争。《江南春梦庵笔记》云苏城克复，“未戮一人”，洵非虚语。苏州是一座人文荟萃的古城，如果发生激烈战斗，不但将造成军民伤亡和大量财富损失，仅以文化上的破坏而论，即难以数计。因此忠王李秀成在占领苏州之后，宽大为怀，不念旧恶，给李文炳以江南文将帅的职衔，属于“天字辈官职，颇加信任”，<sup>②</sup>令他管理昆山县事，并将其侄改名善交，为吴县监军。<sup>③</sup>这对于血债累累的李文炳来说，真可说是仁厚之至了。李文炳如果稍有人心，就应该洗心革面，痛改前非，立功赎罪。但事实恰恰相反，他不仅毫无悔罪之意，而且恩将仇报，坚决与人民为敌。一方面，他钻了李秀成6月2、3两日“入城复出”、太平军在苏州暂未设防的空子，纵兵掳掠，“大肆铄（诛）求，所得金银以五十万计，”<sup>④</sup>给苏州人民带来严重的灾祸，给恢复社会秩序造成极大的困难；另一方面，他又包藏祸心，志存携贰，很快走上搞假投降、待机谋叛的罪恶道路。

### （三）

李文炳投降太平军后不久，就大耍反革命两面手法。他表面上“诚心归顺”，甚至与何信义等为忠王“建白石坊于闾门，其文曰：蠲免钱食，惠德汪洋。永乐其利，民不能忘。恭颂精忠军师忠义忠王荣千岁德政”，<sup>⑤</sup>对李秀成竭诚逢迎腐蚀之能事；背地里，却又“暗通妖兵，谋为不轨”。<sup>⑥</sup>李文炳勾结清朝官吏的确切时间，根据现有史料，尚难遽加断定，或许1860年下半年即已开始。这是因为，太平军1860年6月攻克苏州后，7、8月间即向上海发动第一次进攻。这时，皇皇如丧家之犬逃到上海的一群官绅正走投无路；第二次鸦片战争尚未结束，他们投靠洋人的希望还很渺茫。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把勾结叛徒、阴谋瓦解革命阵营作为重要决策之一，是很自然的。他们之中不少人李文炳既皆旧识，这时纷纷打主意策动李文炳叛变，也是非常可能的。据说“上海某当路谋纳内应，使闾人往说之（指李文炳），未得要领”；逃到上海的原两江总督何桂清为了立功赎罪，也曾派遣一个与李文炳相识的清军官冯日坤去接头，<sup>⑦</sup>正是经过诸如此类的一番活动之后，在苏州地区逐渐形成了一个反革命阴谋集团，其主要分子为徐佩璠兄弟、费玉成父子、钱桂仁、熊万荃、李文炳等人。清方积极策划和参与其事的则有江苏巡抚薛焕、苏松太道吴煦、苏州知府吴云和江苏大劣绅潘曾玮<sup>⑧</sup>等，而吴云似即具体主持人。从《两樞轩尺牋》、《吴煦档案中的太平天国史料选辑》以及其它有关资料来看，薛焕、吴煦、吴云等在李文炳身上是费尽心机，颇加重视的。他们主要从两个方面策动李文炳叛变。一个方面是截留李的母亲和儿子作人质，用来进行威胁利诱，逼迫李文炳从速叛降。这在吴云致吴煦信件的第十七函和吴云《复李某》书中有较为具体的叙述。事情经过大概是这样的：1860年下半年或1861年，李文炳的儿子南官（即阿男）和李的母亲曾先后经过上海，准备去苏州李文炳处。事为一个叫郭振瑞的人侦悉，薛焕立即派人在吴淞口先把南官缉获，后来又拘留了李的母亲。当时李文炳已经向薛焕具禀乞降，表示决心“纠集同志血诚反正并办内应”；也接受过薛焕的反革命经费，“两次会用，已有一万数千两”；还曾多次提供过太平军的军事情报。但吴云等对此极不满足，在《复李某》书中不但要李文炳进一步暗中破坏太平军的军事行动，对太平军出击“应设法劝阻”，而且要他在淮军未到苏常之前，“必须预为布置，得有小小效验”，即必须有重大的反革命立功表现。信中还进一步威胁说，只有在李文炳“建功之后”，才有可能跟他的母子见面，否则他母子的性命怕也难保。<sup>⑨</sup>另一个方面是吴云等派遣间谍对李文炳进行“策反”活动。据吴云致吴煦

信件的第十七函所述，他曾派遣特务分子沈殿魁、沈勇魁二人，以苏州的周庄（反动地主武装据点）为联络点，勾结李文炳叛变。李把他秘密通信用的图章——“平斋珍赏”印二小纸寄给吴云作为信物。沈勇魁先已勾结了一个太平军内奸吴得胜，并和李文炳的一个管文案的心腹人军政同范某（苏州人，原清中军营稿书，投降太平军）熟识，后来沈又串同一个东坝盐贩葛继供，由周庄潜入苏州城，会见吴得胜，交给他一封吴煦的命令，大约是表示接受李文炳投降。那时李去昆山，沈只会见军政司范某。据范说：李常常和他商量叛变之事，“所以迟疑不决者，一则省城踞‘贼’尚众，其大股有三：一两湖人，一两广人，一巢湖人。内惟两广人可以通气，然亦祇广东人，而广西则尚多隔阂。此外，两湖人率皆陈盲（似指陈坤书）心腹，至巢湖人亦不相属也。恐众寡不敌，未敢轻举，此陇西（指李）之迟疑者一也。又恐出来之后，抚宪（指薛焕）不能相容，疑惧之心总不能释，并以孔方（指钱桂仁）曾有谕单而其具禀之后，未荷批发，传闻之词更多不一，是以进退游移，此陇西之迟疑者二也。”吴云本想叫吴得胜向李解释，但又怕洩漏“秘密”，不敢形诸笔墨，因而只把李寄来的“平斋珍赏”图书印二小纸分给范某及吴得胜作为信物，等李回苏，再由范引吴与李会商。范认为如能勾结巢湖帮，李即可大胆，叛变也可能成功。吴得胜又勾结了一个巢湖人姓柴的，部下有三千多人，驻防在葑门。据说还有数起在接头。吴云还建议由苏抚给李一“谕”，他自己加一函，交沈魁殿带到周庄，与葛同去苏州交李，以坚定他叛变的决心<sup>⑩</sup>。从这些材料来看，尽管李文炳勾结清朝官吏的详细经过与具体日程尚有待者订，但在1861年年底以前，李文炳的叛变活动已经异常猖獗，十分频繁，则是证据确凿，毋庸置疑的。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发生了规模巨大的苏州反革命阴谋叛变事件。

苏州反革命阴谋叛乱事件是在1861年冬太平军进军浙江、上海时发生的。那时太平军在李秀成率领下，正以凌厉无前之势，先后攻占绍兴、宁波，12月29日克复杭州，并随之进军上海。而对太平军的节节胜利，中外反动派无不惶恐万状。曾国藩惊呼：“现在浙、苏两省膏腴之地，尽为‘贼’有，窟穴已成，根柢已固”，<sup>⑪</sup>局促上海一隅的外国侵略者和苏浙官绅，处于“风鹤之警，几无虚夕”<sup>⑫</sup>的境地，更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手足无措。正是在这种形势下，经过吴云等人从中操纵牵线搭桥，李文炳伙同了熊万荃，钱桂仁及徐佩瓊兄弟等，“联成一气”，“所部实有三、四万人”，企图乘机在苏州发动叛乱。在吴云看来，这个叛乱在当时可以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一方面，它有“伐魏救赵”、解杭城之围的妙用，他认为，趁苏州叛乱时，清方“遴选一将，统水陆万人，纠合内应，乘虚袭之，兵法攻其必救，无论苏事能否得手，而杭围之解，似有操券之望”，另一方面，它又是“釜底抽薪之法”，认为一旦苏城发起叛变，则“淞、沪之‘贼’，不击可退”。吴云自己对此也确实寄予极大希望并配合行动。他曾函请吴煦派两只轮船前来，“一泊葑腐浜，一泊御塔，一俟永昌（指徐佩瓊处）信到，即可长驱直进”。至于作为叛乱主角之一的李文炳，则更仆仆风尘于杭州与苏、昆之间，竭尽其上窜下跳、纵横捭阖之能事。他先则和熊万荃分别在1861年12月5日和7日从杭州前线“先后托故回苏，即与徐氏兄弟密约举事”，策划让徐佩瓊去上海薛焕处领得军火银二万两，采办大批军火回苏，并定于1862年1月18日发动叛乱；继而在获悉李秀成即将返回苏州的消息以后，两人又立即通风报信，要徐佩瓊提前发难；及至忠王果然先期赶回苏州，叛乱事机败露，李秀成并下令对徐佩瓊所属过往船只，“一概拿解”之时，李、熊又“从中播弄”，千方掩饰，终于使李秀成被一时瞒过，他们自己和钱桂仁、徐佩瓊兄弟等又一次得以荫蔽下来。<sup>⑬</sup>应该指出，这是一起非同小可的反革命叛乱事件。李文炳等的阴谋万一得逞，

其于太平天国后期革命形势的发展关系极大。因为苏州是苏福省的首府，是当时仅次于首都天京的第一个大城市，是太平天国财赋粮食的供应地和江浙战场的支撑点，在安庆已告不守、上游屏障尽失、天京行将被围的情况下，苏州在太平天国的军事、政治、经济上实已处于首屈一指的重要地位。吴云从反动立场估计这一叛乱事件的重大意义时认为，“此不独为东南半壁计，实为天下全局计也”，<sup>②</sup>不是没有道理的。这也就充分说明，尽管这一事件终因李秀成的迅速驰回，“事遂中阻”，叛乱没有成为事实，但李文炳等心同蛇蝎，孽迹昭彰，实已达到令人发指，罪不容诛的地步。

对李文炳这么一个贼性不改的人来说，当然是不会也不可能从失败中吸取教训的。苏州反革命阴谋叛乱事件后，他就打定主意要沿着叛降的道路走到底，决不回头。他曾托徐佩璠转告吴云、吴煦等人，重申自己对清统治者矢志效忠，说倘或被派往上海作战，他一定不会替太平军出力<sup>③</sup>。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确是这样做的。冯桂芬《公启曾协揆》中就说他1862年春间“大举来犯，先期而漏师，交绥而旋遁”，估计“大军一至”，李文炳“或可为倒戈之助”。<sup>④</sup>《燐血丛钞》转引静宜草堂主人《新说》也说他在上海作战时，“徘徊浦东，无故收兵”。<sup>⑤</sup>这样的坏事做多了，总免不了要暴露。不久之后，李文炳的叛降活动终于被李秀成所察觉，处以死刑。

李之被处死是在哪一年呢？据《吴云书信》第十九函说：“常熟钱桂仁于二十九日献城，我辈似可告无愧。木子（指李文炳）之被戕，亦可原其心矣”，<sup>⑥</sup>即当在常熟叛变以前。按骆国忠（非钱桂仁，吴函想系传阅所误）以常熟叛降，事在同治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863年1月18日）。<sup>⑦</sup>又据潘钟瑞《苏台麋鹿记》卷上谓李文炳“管昆山事仅一年，党内猜忌，为刘姓‘贼’所杀”。<sup>⑧</sup>但李究于何时开始管昆山县事则不得而知，因此李的处死时间仍不能解决。王韬说是在同治元年太平军攻上海时，<sup>⑨</sup>大体近是，但仍未载明日。龚又村《自怡日记》卷二十一同治元年四月初四日条记云：“伪文将帅李少卿已为伪忠王剖心，因事机不密，熊帅援据呈伪王也”<sup>⑩</sup>。据此则李之被诛，当在同治元年四月初四日（1862年5月2日）以前。而前引王韬说又云：“时青浦嘉定方为官军所克，声势甚锐，大军围太仓急”<sup>⑪</sup>。按此次清军攻陷青浦嘉定，围困太仓，事均在是年夏四月。<sup>⑫</sup>而嘉定则在四月初三日被英法侵略军与华尔洋枪队联合侵占。<sup>⑬</sup>则杀李日期大抵即在四月初三日（1862年5月1日）了。

关于李被处死的经过，据王韬说是“同治元年李方率党攻上海，颇为‘贼’尽力，挫于官军，辎重悉丧，及回昆山，忠酋（指忠王）以前事颇加猜忌，时青浦嘉定方为官军所克（按青浦此时尚未陷落，此处有误），声势甚锐，大军围太仓急，昆山‘贼’少，于是忠酋遣‘贼’目刘肇钧与李同守，李不自安，而苏、崑乡间潜结团练，以应大军，故洩内应谋，俾‘贼’自翦羽翼，忠酋亦知李素反复，即率大股驻昆，佯作应援太仓者，俟李‘贼’来即命众刃之，党羽同日被杀者五、六百人”。<sup>⑭</sup>这里所述可能有不正确的部分，但据此印证沈粹《避寇日记》卷三所记忠王李秀成诛李文炳后所出告示，则经过情形大体可以了然：

同治元年五月“初五（1862年6月1日）有忠王告示贴在白雀寺前（按寺在秀水濮院镇），言：‘天兵初破苏城，有魏芸青、李文炳二人来辕投顺，即授以天字辈官职，颇加信任。岂料伊等眷属均在上海，暗通妖兵，谋为不轨。某月某日嘉定失守，而青、昆、太三县纷纷告急，本爵即统大兵进剿。李、魏潜出城为妖兵内应，幸有镇守昆山朝将朱察知逆谋，收斩李、魏二人，以正典刑。余皆从宽宥，以明我朝好生之仁。为此出示晓谕，以明天命攸归，人力难挽，倘有逆情，无不败露。自示之后，各宜诚心归化，毋

得二心，等语”。⑤

这两篇可以互相补充参证，并纠正其它记载错误。而《虎窟纪略》云：“同治元年四月，官军收复嘉定，少卿率广匪三百出东门援应，为‘贼’将朱某擒戮”，又可补诸书之不足。李贼谋叛及伏诛经过，大体可以弄清楚了，叛徒反革命得到应有的惩罚，落得个可耻的下场，可算大快人心。他此次虽谋叛未成，其对革命所造成的影响和损失却是不可弥补的，后人应当从中吸取沉痛的教训。

对于李文炳之阴谋背叛太平天国，有人持相反的论点，认为他并没有这种打算，王韬就是坚持这种看法的人。其实他的看法多半出自主观揣测，拿吴云给吴煦的信一对证，都不能成立。例如：他说冯日坤去勾引李文炳投降，两人相见“并无一言”，而吴函明言冯说“李一意反正，毫无疑惧”，那能说“并无一言”？又说“闻有密遣人约李献城投降者，李拘其使几欲杀之，后行贿于‘贼’妻尤氏，言之得释”。明系传闻之词，不尽实有其事。他更断言“同治元年李方率党攻上海，颇为‘贼’出力”，并无意投降，其所以洽降，目的是“外以诳官，内以媚‘贼’”。如果真想投降，当时他的部下“号称十万，子弟腹心密布上海城外，官军声息，呼吸皆知，其所设陈墓‘贼’卡，与官军仅一江隔耳，果欲反正，率众顺流，殊易易也”。⑥这些都是从表面上看问题，并不符合实际。只要知道当时李文炳的重重顾虑，就不难否定王韬的揣测。王韬之所以如此说，是和他个人情绪分不开的。他曾投过太平军，后来逃往香港，太平天国失败后再回上海。他是要借痛骂李文炳来表示自己真心拥护清王朝的。

#### (四)

根据以上论述，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1. 李文炳的一生（他的前半生无可考，目前所能知道的只是他最后大约十余年的历史，大体上说这十余年正是他毕生最关键的一段）是流氓的一生。从他于赌徒为伍到他俨然为富翁止，他过的是流氓生涯，干的是不正当的投机买卖，从而逐步形成他的流氓无产阶级的习性。流氓无产者“这个阶层是动摇的阶层，其中一部分容易被反动势力所收买，其另一部分则有参加革命的可能性”。“在参加革命以后，……应该善于改造他们，注意防止他们的破坏性”。⑦李文炳由破产商人而候补县丞和公所商董，以及后来两次投机革命，又两次背叛革命，出尔反尔，反复无常，正是这种阶级性格的典型表现。

2. 李文炳是个应予否定的人物。他前后两次叛变对革命带来的危害不应低估。前一次背叛小刀会起义，形成了内部分裂，干部死亡，大大削弱了战斗力量，加深了革命危机，加速了起义的最后失败。后一次背叛太平天国，正是1861年前后太平军开辟江浙根据地，建立苏福省，大军向内外反动势力巢穴的上海进军之际。当时敌人偪促上海一隅，惊恐不安，淮军尚未到达，如果太平军不生内变，不难予敌重创，稳定东南大局。但这个有利形势因李文炳的叛变而颇受影响。至于他从背叛小刀会起义后作敌人鹰犬凡六年，长期与太平军为敌，同样罪行累累，擢发难数。但是即便如此，也并不妨碍我们对他参加小刀会起义与苏州开城出降两事的客观效果作实事求是的分析。上海小刀会起义粤闽两帮是主力，李文炳是粤帮领袖之一，他的参加，不可否认地起了相当的组织号召作用；苏城出降，则避免了一场浩劫，客观上无疑地也有其当利于人民的一面。因此，在把动机与效果统一起来对历史人物作出全面评价的同时，又针对其某些活动的具体效果如实地进行分析，我以为是合乎历史唯物主义的。

3. 处置流氓无产者，“是中国的困难的问题之一”，必须“引导得法”。<sup>⑭</sup>李秀成在李文炳问题的处理上，我以为还是有可以借鉴之处的。他在苏州受降是恰当的，因为这有利于加速军事胜利的进程，有利于革命声势的扩大，也避免了不必要的损失。接收一个叛徒投降，保全了苏州城市，其利匪浅，无可厚非。受降之后的处置也是恰当的，因为他对李文炳并未完全丧失警惕，而是先派刘肇钧（一作刘泽钧）镇守昆山，进行防范；又派朱某对加监视，以备不测，并及时发现了李的叛降阴谋，逮捕法办，从而没有给革命造成太大的祸害。尽管在苏州反革命阴谋叛乱事件中曾一度被蒙蔽了，但从全过程看，李秀成对李文炳仍可说是利用得当，处理及时，给后人提供了有益的经验。1862年6月那张告示，打击了敌人，教育了人民，也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注：

① 据王韬《瓮牖余谈》卷七《纪李贼事》：“李少卿者嘉应州人也，始名绍熙，反投‘贼’乃易名为文炳”。但黄本铨《泉林小史》记“李少卿投大营降”事，则谓：“李福州人，为海商，饶有财，被‘贼’胁用，至是逃出，投大营降，纳之发防剿局差遣”。说他是福州人，想系传闻有误。同书还有一条记“粮勇获‘贼’伪帅李绍（少）卿于渣家渡”事，说“绍卿广东人，‘贼’中称万人敌，且狡谲多智，刘‘贼’倚为心腹，会中酒，率其下百余人出大东门直扑南营，伤兵勇数百，将退入城，粮勇乘之，失足堕桥下死”。这个李绍卿虽系广东人，但名字不完全相同，又如此勇武，且已牺牲似另一人。

②③ 王韬《瓮牖余谈》卷七《纪李贼事》。

④ 佚名：《上海小刀会起义始末》，见《上海小刀会起义资料汇编》第38—39页。

⑤⑦ 王韬：《瓮牖余谈》卷七《纪李贼事》。

⑥ 沧浪钓徒：《劫余灰录》见《太平天国史料简辑》以下简称《简辑》第二册第148页。

⑧ 毛祥麟：《墨余录》卷二《李绍熙》条。

⑨ 《吴煦档案中的太平天国史料选辑》第20页。

⑩ 同①，又见《瓮牖余谈》卷七《记李贼事》。

⑪⑫ 《瓮牖余谈》卷七《纪李贼事》。

⑬ 王步青：《见闻录》第5页。

⑭ 毛祥麟：《墨余录》卷二，“李绍熙”条。

⑮ 潘钟瑞：《苏台麋鹿记》卷上：“江苏候补府李文炳，广东人，开胥门以延‘贼’，‘贼’官之为伪文将帅，即出外，俾管崑山县事”。又王韬《瓮牖余谈》卷七《记李贼事》云：“庚申春间，李方带勇在吴门，‘贼’悉锐南下，其氛日逼，徐中丞（苏抚徐肖壬）仓卒间委以城守，对‘贼’游骑已至城下，李营勇目有黄、魏二姓者，竟诣‘贼’纳款，而李与何信义大启阊门（前书云胥门，按据《虎窟纪略》太平军实自阊、胥二门同时入城。大约因此或作阊门或作胥门）迎伪忠王入，李受伪职为江南又将帅，为‘贼’主理崑山事。”（前引两书，一称江南文将帅，一作江南又将帅。按各书均作“江南文将帅”，且据《瓮牖余谈》同条所记投降勇目魏姓受职“武将帅”，及后来在浙江封何文庆为“浙东文将帅”之例，可见“又”当系“文”之误）叙事虽略有出入，但皆说他是在苏州投降太平军的。沈梓《避难日记》卷三记李秀成诛李文炳告示中亦说他是在苏州投降的。此外，《见闻录》、《虎窟纪略》等书也都如此说。当以在苏州投降为可信。

⑯ 佚名：《虎窟纪略》，见《太平天国史料专辑》（以下简称《专辑》）第25页。

⑰⑱ 沈梓：《避寇日记》卷三，见《简辑》第四册第156页。

⑲ 王步青《见闻录》第6页。

⑳ 沈梓：《避寇日记》卷三，见《简辑》第四册第156页。

㉑ 佚名：《虎窟纪略》，见《专辑》第15页。



- ②② 谢绶之：《燐血丛钞》卷四，见《专辑》第412页。
- ②③ 谢绶之：《燐血丛钞》卷三，见《专辑》第410页。
- ②④ 沈梓：《避寇日记》，见《简辑》第四册第156页。
- ②⑤ 《瓮牖余谈》卷七《纪李贼事》。冯日坤大约是个两面勾搭从中取利的人物，后来因替太平军购买枪枝，被李鸿章查获枪杀。
- ②⑥ 谢绶之：《燐血丛钞》卷四引静宜草堂主人《新说》，见《专辑》第41页。
- ②⑦ 见《吴煦档案中的太平天国史料选辑》第76页《吴云书信》致吴煦第十七函及《简辑》第六册第140—141页《复李某》书。又《虎窟纪略》和冯桂芬《公启曾协揆》中也有关于这方面的记载。《虎窟纪略》云：“时其（指李文炳）眷属由粤之苏，为官军缉获，不杀，会其母以书致子，使归身赎罪，少卿具言不得已从‘贼’，许为内应”（见《专辑》第41页）。《公启曾协揆》则谓：“‘闻贼’中送款中丞者不少，苏州李绍熙至以母子为质”（见《显志堂稿》卷五），均可参看。
- ②⑧ 《吴煦档案中的太平天国史料选辑》第75—77页。
- ②⑨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十四，《浙省失守徽郡被围通筹全局折》。
- ③⑩ 吴云《致乔鹤侗中丞松年书》，见《简辑》第六册第132页。
- ③⑪ 以上均据吴云《又致吴晓帆方伯煦书》及《致周韬甫主政腾虎书》，见《简辑》第六册第135—138页。
- ③⑫ 吴云《致永昌徐少蓬戊卿兄弟》，见《简辑》第六册第139页。
- ③⑬ 吴云《又致吴晓帆方伯煦函》，见《简辑》第六册第136页。
- ③⑭ 《显志堂稿》卷五。
- ③⑮ 《燐血丛钞》卷四，见《专辑》第412页。
- ③⑯ 《吴煦档案中的太平天国史料选辑》第78页。
- ③⑰ 谭嘘云《守虞日记》、《吴煦档案中的太平天国史料选辑》第78页。而《太平天国史事日志》则谓骆等降于1863年1月16—17日，待考。
- ③⑱ 见丛刊《太平天国》第五册第272页。
- ③⑲④① 《瓮牖余谈》卷七《纪李贼事》。
- ④② 见《简辑》第四册第441页。
- ④③ 佚名：《虎窟纪略》，见《专辑》第40页。
- ④④ 柳兆薰：《柳兆薰日记》，见《专辑》第251页；又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第889页。
- ④⑤ 《瓮牖余谈》卷七《纪李贼事》。
- ④⑥ 沈梓：《避寇日记》卷三，见《简辑》第四册第156—157页。
- ④⑦ 《瓮牖余谈》卷七《纪李贼事》。
- ④⑧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08—609页。
- ④⑨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9页。

## 科 研 简 讯

为了了解国外文艺理论教材情况，我院中文系文学理论教研室翻译出版了日本玉川大学滨田正秀教授近作《文艺学概论》（一九七七年版）一书。

该书是据作者多年文艺理论教学之经验，又博采西方文艺学理论的各家之长整理、编写而成的，行文简洁，论述清晰。曾于一九七九年秋季日本在沪举办的“图书展览会”上展出。